

法国文化空间与上海现代性： 以法国公园为例

苏智良 江文君

〔提要〕公园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一道进入上海。法国公园是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最著名的一座法国式公园,有上海的卢森堡公园之美誉。法国公园的百年沧桑变化,见证了近代上海新型公共空间成长的历程。法国公园所承载的“现代生活”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所限,是一种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经历。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新事物,反映了这个城市曾经与世界的大融合。法国公园的诞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它的出现与演变体现了中法两个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在彼此的差异中可以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在法国公园内,上海人体验了以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愉悦和感受上,更反映在都市人价值观念层面的更新与变迁上,启蒙了他们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法国公园;上海现代性;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TU986 G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032-12

〔作者简介〕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234

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公园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一道进入上海。究其起源,它原本是西方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新鲜事物。工业革命初期的欧洲,一些皇家贵族的园林逐渐向公众开放,形成最初的公园。在人口急剧增加、污染比较严重的欧洲都市中,市民们不满于程式化的工作与周而复始的上班制度,于是休闲的观念开始出现。再加上欧洲的城市规划者提出“都市之肺”的理念,在各大都市开始营建公园。这一时期的公园已经不再是“再现自然”,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自然”了。^①

法国公园(二战结束后改名复兴公园)是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最出名的一座法国式公园,有上海卢森堡公园(对比法国巴黎的那座卢森堡公园)之美誉。作为上海最重要的法国文化空间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城市风景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它的沧桑变化,见证近代上海新型公共空间成长的历程,缩影了时代的变迁。

历史沿革:从“法国公园”到“复兴公园”

复兴公园位于淮海中路南侧的雁荡路 105号,东邻重庆南路,南临复兴中路,西近思南路,北与科学会堂等为界。公园有三个大门出入:南门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转角;北门在雁荡路;西门出皋兰路,全园面积 8.89万平方米。^②

公园的原址是顾家宅村的农田。1900年,法租界公董局以规银 7.6万两购买这里的土地 152亩(10.13万平方米),并将其中 112亩(7.47万平方米)租给法军建造兵营,所以此地被称为顾家

① [美]A.泰特著《城市公园设计》,周玉鹏、肖季川、朱青模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第2页。

②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版,第98页。

宅兵营。^① 驻扎在此的法军曾经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 1904—1907 年期间陆续撤走。^② 这个兵营逐渐空荒冷落下来后，1904 年，法商球场总会向公董局申请并获准租地建造网球场、停车场等，公董局仅每年象征性收取 1 法郎的租金。1908 年 7 月 1 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聘用法国园艺家柏勃（Papot）主持设计，把顾家宅前法国兵营改建为公园，并责成工务处提出建设方案。1909 年 6 月公园落成，同年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日）开放，名顾家宅公园，俗称“法国公园”。^③ 1943 年，汪伪上海市政府以所谓收回租界主权的名义，改园名为大兴公园，但实际上却成了日军的练兵场，市民因为惧怕而不敢前往游玩。^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市工务局接管公园，并于 10 月 10 日开放，“顾家宅公园（即前法国花园）自为敌伪占据后，市民对之咸有魔窟之感，自投降后，即由我方接收，亦自今晨起开放，以供市民游览云。”^⑤ 嗣后，自 1946 年元旦起，国民政府为庆祝抗战胜利更名为复兴公园，寓意民族复兴。

公园早期面积狭小，局限在今复兴公园中部。正式开放后，公董局陆续购买了 2 万平方米土地，将公园延伸至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915 年拆除了园西北占地 9300 平方米的马厰，1918 年将华龙路（今雁荡路）南段（今复兴公园东部连接南、北园门的主干道）及其以东的一块土地划入公园，把在园南的公董局警务处俱乐部迁出，1924 年又拆除了园旁的最后一批法军营房。^⑥ 随后将环龙路南段的马路并入园中，和原先的大草坪融为一体，作为法租界进行重大阅兵活动的场所之用，至此法国公园始具规模。公园东界的华龙路先前是法军营房的对外通道，原名军营路，路段和今天的雁荡路大致相同。公园曾经先后建过 4 道园门。^⑦

需要指出的是，柏勃当初的设计，基本仿照里昂金头公园之经营图。在今天公园的中部，仅用水泥、砖头，砌建几个大的几何形花坛，铺设草坪，草坪边上建了个音乐演奏厅和几座简便避雨棚，景致相对较少。此外，整座公园按照法国园林布局展开，与凡尔塞及枫丹白露等处园林相同，皆是法国式公园之代表，而与英国式公园之纯任自然，为广漠之草场者迥别。然而，简易的景致无法满足法租界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1912 年，法国公董局为纪念法国飞行员环龙（Vallon），^⑧ 决定将正在拓建的道路定名为环龙路（今南昌路，雁荡路向西的一段），在公园内的西北部（今儿童乐园围墙外的西北角）建造一座环龙纪念碑。^⑨ 1917 年，公董局聘任法籍工程师如少默（Jousseau）负责公园的大规模扩建和改造。设计方案于 1918 年基本通过并开始施工，但是由于涉及到几个单位的拆迁，工程断断续续地进行，设计方案也不断修改。^⑩ 1925 年，年仅 22 岁的中国园艺设计师郁锡麟对公园进行了新的规划，将法国式的园林巧妙地糅合了中国风格的造园艺术。^⑪ 到 1926 年，改建工程基本完成。

改建后的公园以法国规则式与中国自然式相结合的布局展开，北、中部以规则式布局为主，有

①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 98 页。
② 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
③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 98 页。
④ 张学森：《园林记趣》第 32 页。
⑤ 《文汇报》1945 年 10 月 10 日。
⑥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 98 页。
⑦ 第 1 道就在香山路（原名莫利爱路），以后又陆续兴建了重庆南路（原吕班路）、复兴中路（原辣斐德路）、南昌路（原环龙路）处的园门，最后在皋兰路（原高乃依路）东端建一园门。
⑧ 法国青年飞行员环龙（Vallon）于 1911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上空作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身亡。这是飞机第一次在上海飞行。
⑨ 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第 37 页。
⑩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 99 页。
⑪ 据设计师郁锡麟晚年回忆，对于法国公园设计规划的中法融合，一开始法国人不理解，认为园林不是这样的，园林不应该这样造。后来郁锡麟对他们说，中国园林就是这样的，还带着法国人去沪上有名的赵家花园游览，在亲身领受了中国园林的魅力后，骄傲的法兰西人终于折服了。复兴公园南部中国风格的设计方案才得以保留下来。参见谢晓霞：《复兴公园是他设计的——访九六老人郁锡麟》，《园林》1999 年初秋版。

毛毡花坛、中心喷水池、月季花坛以及南北、东西向主要干道。西南部以自然式布局为主,有假山区、荷花池、小溪、曲径小道、大草坪。^①这一部分的法国公园,园林格局匀称,点缀着喷水池,交织着一条条林荫小径,展现出法国古典韵味。公园的南面则是1916年辟建的动物园,起初是法侨赠送的几只鹤和两只天鹅,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小动物。^②值得注意的是,公园西南部面积2000平方米荷花池,被两条小土堤分割成三个水池,宛如杭州的内、外、里西湖的风景。公园的西南角,利用挖出来的池泥和太湖石块,堆砌成不甚高的大假山,山路幽弯,林木荫茂,山顶上一座水泥亭可眺望园中全景。崖下有一山洞游人可穿入,山水花草引人入胜。改建后的法国公园,中西合璧,其景色在当时上海公园中独领风骚,首屈一指。

早期的法国公园是中国土地上的一座外国花园,和普通市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就心理层面上而言,西式公园(如法国公园)成为在沪外国侨民怀乡投射的慰藉。法国公园一方面使旅沪法侨将思乡的情绪投射到公园的营建上,在上海构筑“东方巴黎”之梦;另一方面亦可宣扬法公董局殖民治理的成就。作为展现租界在法国治理下的进步象征,公董局对法国公园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规范与程序。30年代的法租界公园章程规定:凡持有该年入园券者,概准进入公园;公园开放时间,自10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每晨6时起至夜间12时止,4月1日至10月1日每晨5时起到夜间11时止;凡年龄在12岁以下者可免票,但应有成人相伴;小贩、乞丐、衣衫不整者、传染病患者、狗(不管有无戴口罩)、车辆(除小孩车、残疾人车外)都不准进入公园;同时规定游客要爱护公物、维持治安、保持清洁;游戏散步仅可围绕大草地;违反章程者处以5角以上50元以下罚金。^③

法国公园的门票收入亦是公董局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1933年,公董局将法国公园游览券改为租界内各公园统一的游览券,无论外侨或华人,只须花一元钱购买一张常年票,便可以进入法租界内各公园,另设临时门票每张一角,可游一次。^④低廉的门票价格,使得相当多数市民都具备了入园消费的能力。根据《法公董局公报》里种植处的统计,1939年法国公园全年游客量为2513563人,假设他们全部持年票入园,按照每人一周去一次的频率,那么售出的年票为48205.3张,即48205.3元;1940年的游客量为3112277人,按照以上的计算,售出的年票为59524.4张,即59524.4元。^⑤这尚且是比较保守的估算,因为除持有年票者外,购买临时门票的游客也为数不少,所以实际的收入应远远不止其数。

公董局亦会从预算里拨出专款用于公园的日常修缮。譬如1931年法租界公报记载:“查得顾家宅公园内一段园路,现有修缮之必要,拟请在本年度经常预算下,追加该项修缮经费。”^⑥1935年2月18日公董局常会议决,“在顾家宅公园内,采用竹顶交付竹篱,并在园内各处之外围,加围竹篱,而华龙路园门口处则加装铅铁板”,以防不速之客擅入公园。在管理方面,法租界也是查微杜漏,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那些没有游园券的人,严禁他们擅入霞飞路、白复仲路以及麦琪路三角园地间的宝昌草地。^⑦如此严密的戒备,源于自命不凡的法国殖民者认为华人有所谓固有的劣根性。他们对华人抱有种族偏见,认为中国人贫穷而又贪婪,所以不会自己买票进来游玩,相反会偷偷地溜进来。

法国公园一方面是殖民者满足怀乡慰藉的寄托,又同时展现上海租界治理成就的荣耀,从中可

①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100页。

② 程绪珂:《上海园林志》,第99页。

③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公报》卷一,1936年,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第134页。

④ 抗战爆发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公园门票也随之水涨船高,“去年(1939年)起常券每年每人三元,临时门票每张售一角;不过市面上银币缺少之后(按:园的入口处,置有一售票机,必须以银币一枚置入机内,始得一票),对临时购买门票的,又感受到一种不便”。参见德麟:《顾家宅公园》,《上海生活》1940年第8期,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部,第25页。

⑤ 参见《法公董局公报》1939-1940年,J-0131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

⑥ 上海档案馆档案U38-1-2840《法租界公董局华文公报》第16号。

⑦ 上海档案馆档案U38-1-2840

以蠡测法租界公董局试图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一种现代化秩序的努力。

市民的休闲空间：日常性与公共性

去公园游玩自然是摆脱工业化都市的嘈杂、亲近自然的一种休闲活动。与这一时期亚洲其他殖民地城市（如日据时代的台北）不同的是，虽然同为殖民当局依循都市规划所营建的公园，但上海公园更加凸显市民休闲功能，而较少意识形态的灌输。租界时代的公园，虽然其建园伊始即采取种族隔离措施，排拒华人入内游园。但在随后华人市民群体的抗争下，公园向全体华人开放。因此上海的公园大抵还是以民众的需求为目的，主要服务于新兴的中产市民群体，而非仅仅是现代化进步的象征“装饰”而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公园在一定层面上，仍须服务于殖民当局政治宣传，譬如法国公园内的环龙纪念碑。与日本人在台湾的公园营建一样，在上海的法国殖民者时刻将思乡的情绪投射到公园的营建上，即总是期望在上海复制故土法兰西的公园美景。但这份对自然的亲近却可谓是无分中西，乃人类天性使然，毫无矫饰做作。

相比于其他租界公园的喧嚣，法国公园则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乐园了。在此可以领略另一种风韵情调：

浓密的法国梧桐，很整齐的排列着，在它们发育成长的过程中。是经过了一番人工的修饰和裁剪，漫步在夹道的桐荫中，似乎并不引来多少美感。一到傍晚，那一片大的草坪，就成了露天的宿舍，白的、花的，各色的被单铺满了草坪，母亲怀里抱着吸奶的婴儿，还有一两个较大的孩子伏在背上撒娇或者闹着要喝水，当爸爸的无可奈何的在一旁呵斥着。这一群市民们。似乎只有这一刻是比较自由的，至少可以说是轻松了一点。可是有时还是可以隐约听见一点。也许妻子在抱怨丈夫酒喝多了，说不定也为了太太打麻将输了几天的菜钱而抱怨。^①

在这篇杂文里，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调，描绘了复兴公园的傍晚。市民们纷纷赶到公园里来，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宁静。忙碌了一天的小家庭，在公园的大草坪上享受着美妙的天伦之乐，可谓人生如此，夫复何求？相形之下，夏日的法国公园亦是别有一番雅致：

公园的地点适中，环境清幽，一行行长列着法国产的梧桐，同原野似的草坪，雕型的玲珑小巧的假山，涟漪生致的小池，喷水的亭，有人说法国人擅长园艺，他们的京城巴黎，有世界花都之称，果然这句话是并非溢美，我们从这园的布置，可以见到法人对于园艺的爱好和研究。……整个园景中，已披上初夏的外衣，浓绿的树荫，风过时及摇曳生姿，分筛的树影，交织在地上，池的正面，安着木椅，你如果走得倦时，尽管入座小憩，目注在池上的涟漪，虽没有儻鱼，却也具着庄子濠梁之乐。……总之，初夏在法国公园是值得留恋的！^②

而在冬日的法国公园：

园门前意外的静寂，……天冷，游客稀，……冷酷的风霜，剥夺了花朵丰润的生命，青春易逝，落叶片片，现在只剩下了干枯的枝。……简陋的喷水池边，四围坐着悠闲的男女，有的看书，有的相依密谈。走到大池边坐了下来，看到对面向阳的一面，一株梧桐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脱落，太阳往疏稀的叶子反映出刺目的光辉；树木的夹道下，远远窥去，人影恍惚，偶然有一二

① 《都市里的绿洲》，《新民晚报》1946年8月7日。

② 雄白：《夏在法国公园》，《上海生活》1939年第6期，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部，第30页。

位青年的女子,在对面的小桥上踱过。……太阳渐渐西下,萧条的园中,披上一层辉煌的金光。^①

一年之中的不同季节,公园都有着风情各异的不同景致。倘若办公的写字间毗邻公园,恰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法国公园附近的洋行写字间工作的职员就描述道:“六小时的工作完毕之后,得到解放,马上一拐弯走向法国公园去溜达溜达。这几乎成为我刻板生活中一个小节目了。好在有的是派司,逛公园不但可以赏心悦目,说不定还有点意外的收获。”^②法国公园的存在,给予都市人体会自然的自由,是近代上海都市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在附近的文艺名人,亦时常去法国公园游玩散心。一篇报道描述电影演员陈娟娟在法国公园游玩时写道:“最近她(陈娟娟)的生活,又舒服了,因为《杜十娘》已完竣,而《白雪公主》也许还得缓一时期。每天起身很早,因为天热,除了免不脱的外出,每天下午五时左右由婆婆带着同往顾家宅公园游玩,还带了许多面包蛋糕,作为野宴。”^③作家郁达夫和他文艺圈的朋友们也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当月朗风清的晚间,我们特地乘电车去逛顾家宅公园,我们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不着边际地漫谈起来。达夫知道我读过法文,总怂恿我跟冷食店的法国侍者讲法语。”^④在他们眼中,法国公园是优雅的、家常的、亲切的。他们采用法国风尚、礼仪、生活方式和语言,把这些看作文明生活的国际标准。

法国公园还以承袭了法兰西的浪漫风情而著称,是青年男女约会的理想地点。以至有人“在法国公园逛了两三点钟,竟给我发见了三四次情节差不多的恋爱”,“在法国公园打了三个圈子,就可以吊上一个女人。”^⑤老记者陈凡也推荐:“凡是有朋友谈恋爱而又要到公园去谈的话,我便极力推荐兆丰公园和法国公园,前者以辽阔胜,后者以幽曲胜,不可以伯仲论也。”^⑥摩登情侣们显得相当大胆和开放,在园内各处都可觅见他们的踪影,“树林的深处,一对对的野鸳鸯在窃窃私语,青年伴侣在细语着,好像在谈情说爱,我不便去打搅他们,只装不看见抬着头折向别处去,免得他们难堪,甚至于送我一个白眼。”^⑦“假山荫后,树木深处,往往有对对的情侣在喁喁清谈,他们恐已忘记了身在何处了。”^⑧显然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公园、电影院等一系列新型公共空间向女性敞开大门,男女自由交往的城市空间被空前扩大。

公园内还有其他许多现代设施项目供人娱乐游玩,譬如动物园即是园内重要景点之一。该座动物园是上海市立动物园无偿将动物移交后的产物。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即由该园(市立动物园)主任沈祥瑞氏,将大部分动物寄养于顾家宅公园”。^⑨11月2日,公董局在收到来函后决定,“本董事会准上海市动物园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函。以该园若被炸,则猛兽有出柙之虞,势将危及南市人民,方请准将该动物园移养于顾家宅公园等由”。^⑩就此接收市立动物园的这批动物,并决定扩建顾家宅动物园。

动物寄养在法国公园后,由于“大家都知道兆丰公园里有一座动物园,吸引着不少游人,而游人确在这动物园里得到了许多乐趣。法国公园似乎也是知晓了这一点。所以在公园的东北部也设了

① 霜君:《法国公园之冬》,《家庭与妇女》1940年第2卷第1期,第14-15页。

② 《法国公园》,《文汇报》1939年3月18日。

③ 《拍完“杜十娘”陈娟娟休息:每天逛法国公园,白雪公主将缓摄》,《中国影讯》1940年第1卷第25期,第198页。

④ 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⑤ 袁进主编《民国名刊精选》(《红杂志》《红玫瑰》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⑥ 陈凡:《一个记者的经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⑦ 《秋到人间复兴公园小景》,《天下》1947年第1卷第5期,第19页。

⑧ 《尹桂芳随笔:在复兴公园中》,《芳华剧刊:尹桂芳专集》1947年,第75页。

⑨ 《文汇报》1946年1月10日。

⑩ 《上海法公董局公报》,1937年,J-0131,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

个动物园。据说四五月就可以完成，六月中旬就可以开启了。”^①1938年6月23日，法国公园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

动物园落成后，吸引了不少游客尤其是儿童，而进入动物园亦需另购门票，时文记载：“……又买了票子，走进动物园，敏儿每次来都要去看看十几只猴儿……”^②动物园里豢养着许多珍禽异兽，游客说“我最爱那头雄狮，和母虎，狮虎的柙，有很粗的铁柱，防它们出柙伤人，柙分内外二层，内层为其宿处，外层为饲养人递食物处，当我们走近柙。那头母虎正做它的周公的好梦，它好像怕羞似的，不拿睡态向人，该套一句，追韩信剧词，所谓三生有幸，那雄狮的英姿，确够得上威武二字，高视阔步，有旁若无人之概。”^③一名幼童亦在随家人参访动物园后，阐发如此感叹：“今天是儿童节，早上，大约九时许，我和哥哥、姐姐随了父母亲，到法国公园去游览。……公园内，只见那些树木，很整齐地立着，还有那终日喷着水的喷泉，那是多么美丽的天然风景啊！动物园里，有英武的狮，虎，有趣的猴子，骄傲的孔雀等，真是难以形容。”^④

在繁忙的音乐季里，法国公园内循例还会有音乐会演出，“组织夏季音乐会。其在顾家宅公园者，系为铜乐演奏，时间为每星期三下午五时至六时三十分。”^⑤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该年6月15日至9月2日这一季，管弦乐队在法国公园演出7场，管乐队则在该公园演出13场，即便是在时局动荡的1941年，管弦乐队在法国公园也演出了一场。^⑥西式音乐会的兴盛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艺的新趣味，即一场“趣味革命”。西式音乐以其摩登的外表和新颖的形式，吸引着口味不断翻新的上海专业人士和职员。

就地理区位而言，上海公园的繁华离不开住宅的发展。公园尤其是租界内公园大多位于中高级住宅区周边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与西方情况相似，西式公园乃是作为住宅周围的附属品或福利设施，能否进入公园往往取决于其周围居住的居民。以法国公园为例，周边社区即是法租界长期以来倾心营建的高级住宅区。名记者金雄白就回忆道，“我那时是住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斜对面就是俗称法国花园的顾家宅公园，离大学仅数步之遥。万宜坊的业主是中法储蓄会，三四条里弄，一律都为单开间三层楼的。”^⑦公园周围生活过的一些人物，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⑧

公园所提供的公共休闲空间是相当大的，这是居民私人空间以外延伸出来的另一空间。经历了城市化的割裂进程，上海人更懂得生活的本味只在于安逸和享受，公园也成为都市人解压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寻找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

法国公园：一个微型的政治空间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空间，法国公园的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文化休闲的范围，进而呈现为一个微型的政治公共空间。因此，近代上海的各种力量都将公园视为其展开政治话语论述的权力场域和公共政治“表演”的舞台，意图控制与形塑公园政治。

作为一种公共空间，20世纪20年代上海智识阶级（中产阶级）关于公园开放问题所展开的论

① 倩兮：《春天在法国公园》，《青年周报》1938年第6卷第9期，第9页。

② 霜君：《法国公园之冬》，《家庭与妇女》1940年第2期，第15页。

③ 雄白：《夏在法国公园》，《上海生活》1939年第6期，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部，第30页。

④ 垦荒：《儿童节游法国公园记》，《小主人》1939年第2卷第12期，第26页。

⑤ 《上海法公董局公报》，1939年，J-0131，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

⑥ 上海文化音乐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音乐志》（内部资料），第478页。

⑦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7页。

⑧ 诸如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与复兴公园仅一墙之隔。皋兰路上的张学良故居，也是公园近邻。思南路上的周恩来公馆和梅兰芳故居，重庆路上的邹韬奋故居等等。

述话语, 成为了民族主义“派生话语”的典型范例。

1909年法国公园建成开放, 法租界当局公布的章程即对华人执行种族歧视政策, 与公共租界保持了默契, 其细则如下: (1) 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 中国人, 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 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 一切车辆, 无论是马车、人力车和脚踏车。(2) 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许入内。(3) 园中花木鸟巢禁止攀折, 严禁破坏公用椅凳。(4) 不得破坏草地内游戏用设备。(5) 公董局保留有权利发给华人入园券。^① 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滩公园更加苛刻, 法国公园对中国人的羞辱比之更甚。因为, 依循该公园规定, 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尚且能被允许入内。但中国人 (除非是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 却是一概不得入内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 依循法租界颁布的公园规章, “当时该公园章程, 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 不许中国人入内, 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 加套口罩为条件”。^② 此中关于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 尤令人感到屈辱, 租界当局似乎惟恐中国人呼出的空气也是带有传染性的疫病病菌, 从而危及到西方侨民的身体健康。

一成不变的看法往往导致种族主义和偏见, 它使群体相隔离, 促成一方的傲慢和另一方的愤恨。到了 20 年代中期, 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殖民势力接触的过程中被激发起强烈的政治抗争。例如郑振铎就公开呼吁“‘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 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 ‘收回租界’, 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 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③ 廖沫沙也曾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 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 免不了感到侮辱, 愤慨万分”。^④ 诗人蒋光慈哀叹道: “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唉哟, 中国人是奴隶呀!”^⑤ 一般民众也感知到“富丽堂皇的法国公园, 在从前, 我们中国的同胞和狗是不许入内的; 纵是要走进去, 也一定要穿西装; 因为穿上了西装, 可以冒日本人的牌。”^⑥ 可见,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 其“话语”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 就以自己在法国公园的亲身经历对殖民者加以痛斥:

朋友, 我因无钱读书, 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 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 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 找事难于登天, 跑了几处, 都毫无头绪, 正在纳闷着, 有几个穷朋友, 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 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 全身突然一阵烧热, 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 反而禁止华人入园, 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 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 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 还能生存下去吗? 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 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

朋友, 我后来听说因为许多爱国文学家着文的攻击, 那块侮辱华人的牌子已经取去了。真的取去了没有? 还没有取去? 朋友, 我们要知道, 无论这块牌子取去或没有取去, 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人, 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 是至今没有改变的。(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⑦

然而, 所谓集体记忆往往是构建想象而成的。譬如, 引发人们争议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

① 参见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26 页。

② 德麟:《顾家宅公园》《上海生活》1940 年第 4 卷第 8 期。

③ 郑振铎:《上海之公园问题》《文学周报》1927 年第 4 期 (总第 262—263 期合刊)。

④ 《申报·自由谈》1933 年 5 月 12 日。

⑤ 蒋光慈:《新梦哀中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42 页。

⑥ 畫舫:《上海解剖之一: 法国公园的认识》《红玫瑰》1929 年第 5 卷第 32 期, J—0002, 上海图书馆缩微胶卷。

⑦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烈士狱中遗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 页。

子实际上掺杂着传说与真实。《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鲍惠尔就此回忆道：

那时，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到这个公园来的注意事项和若干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了禁止攀折花木，毁损公共财物外，还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而紧接着这一项，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就是这一块木牌上的规定，后来变成中国人和外国人间很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当这个问题愈闹愈严重，愈闹范围愈扩大之后，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便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人不许入内。”^①

可见，外滩公园门口的确挂有限制中国人和狗入园的告示牌，而一般所想象的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文告示牌却未必存在，仅仅是个传闻而已。把一块告示牌的存在与否赋予救国保种的观念意义，本质上讲是观念的象征性物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民族性的观念或者民族主义情绪的灌输和规训，仍然难脱知者掌控被知者的窠臼。知识分子凭借自己对话语的垄断，将唤醒民众的艰巨任务交付给自己。外来且易于操弄的“民族主义”观念便成为巩固其权威的最佳工具。公园游园问题在当时所形成的集体记忆，给上海新兴的中产市民群体以相当大的伤害。租界公园作为殖民者营建的殖民性空间，无时不给身处上海的中国人以受压迫的感觉。并藉由此种“受害性（victimization）”，衍生出一系列激进的话语表述。当年的激进青年们就曾为之气愤不已，毫无顾忌地发表激越的言论，“我们这些幼稚的青年学生经常议论：中国取得独立后，我们要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上‘狗与英国人、美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要在法国公园门口挂上‘法国人与狗不得入内’。”^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掺杂着传说与真实的故事，其意涵由民族受压迫的屈辱象征，进而“创造转化”为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政治符号，被知识精英纳入其所掌控的话语空间，据此建构了普遍认知的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随后转化成民族主义意识和实践。^③

20年代后期，随着北伐而起的国民革命在客观上亦配合着上海城市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慑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公共租界当局被迫于1928年通过《公园开放案》。同年6月1日，外滩、虹口、兆丰3公园对华人开放，同时确定售票制度：年券售价1元，零券每次铜元10枚。^④同年4月16日，法租界决定由施维泽、利荣、魏廷荣组成特别委员会，讨论修改顾家宅公园章程，“（1928年）六月十八日，新章起草完后，改用门票入园的办法，华人从此始得一元的代价，享受当年游玩法国公园的幸福，而此时按照新章第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狗却不能入园了，即罩有口套及有人牵带者，也没有入园的资格。”并认为这是“我国国际地位进步”的结果。^⑤修改后的《法国公园规则》于7月1日开始实行。^⑥有趣的是，在华人争取到了游园权利的同时，狗却不能入园了，即便罩有口套及有人牵带的狗，也没有入园的资格了。这无疑是对西方殖民者的绝妙讽刺。

然而，即便是公园开放后，上海人对于法国公园的情感依然是爱憎交杂的。一位现代派作家就曾颇有感触地写道，“四个人带了两张门票走近顾家宅公园的时候，我忽然发生了一点憎恶的感情：我明白这所去的地方是必须使我们经过了一种资本主义威权之下的侮辱。”^⑦作为“殖民性的现代性”之产物，法国公园隐喻着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权力不平等的屈从，而这种权力又是

① [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尹雪曼等译，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7页。

② 喻权域：《喻权域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③ 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可参见苏智良、赵胜：《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较量——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字资料的历史解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④ 《申报》1928年6月2日，另可参见上海通讯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478页。

⑤ 德麟：《顾家宅公园》，《上海生活》1940年第4卷第8期，第25页。

⑥ 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526页。

⑦ 柯灵、完颜绍元编选《玻璃建筑——〈现代〉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以殖民主义为基本成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遗产。

除了作为中西力量角逐的权力场域外,法国公园也经常作为重大纪念庆典活动以及文艺演出的理想舞台。在这一过程中,公园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公共场所的使用功能超出了原先的设计要求,于是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法租界公董局在此将公园作为教化其本国侨民的场所,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确认其合法性,即将政治符号通过公园这一开放性文化空间向民众进行灌输。

1918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世界大战,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毕。消息传到上海后,12日晚上,“法国人在法公园开叙乐会,有跳舞游戏等种种娱乐,与会者每人纳费五元以示欢怀”。^①15日,“谕令各工人在顾家宅公园及各机关、各捕房、黄浦滩等处竖立木杆悬挂灯彩并扎电灯以便定期庆祝”。^②21-23日是协约国各国驻沪领事决定的庆祝,由外方发起并主持,所以也是法租界正式大庆的三天。期间,“法租界大马路直至法国公园之间几有全化为火海之观”。^③法租界总领事馆前及新租界顾家宅公园均用松柏扎成大牌楼各一座。“顾家宅公园内扎有电灯数千盏,开演影戏,以娱乐来宾。捕头深恐,游人拥挤,匪徒有乘隙攫物情事,故谕飭各探捕严行巡察以卫行人”。^④此外,“22日午后2点为公民游行队,计汽车队与马车、包车队分而为二,汽车队于午后二点齐集沪宁车站前,出北河南路转北苏州路过外白渡桥穿过英领事馆沿黄浦滩至法领事馆转法大马路直达法国公园而散”。^⑤在此三天期间,“顾家宅公园仍演影戏,加放焰火并备茗点款待来宾”。^⑥

法国公园不但是民众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公共娱乐空间,而且是法国当局政治宣传、政治社交的平台。例如,1914年5月16-17日公园内举行品花大会,各国官商与会欣赏游玩,“法新租界顾家宅法工部局所设之公家花园,园内奇花异草种植甚多,现经局董等择于今昨两天特开品花大会。英界各花园各花亦携至该园陈列,并柬邀法总副领事及各国官商与会赏玩,并于晚间十一点开演影戏以娱来宾。”^⑦以此为高尚社交场所,藉此广结人脉,扩展法国在上海租界内的影响力。

公园作为都市中的自然区域不仅是中产阶级市民假日游玩休憩的场所,又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时人提出,“公园者可以养吾人之道德心。”在这位作者看来,“极高尚之娱乐则国家愈文明”,而公园游乐就是这样的极高尚之娱乐。不仅如此,公园也经常作为重大节庆庆典的理想舞台。

自落成伊始,法国公园一直是法租界节庆活动的中心,每年的法国国庆庆典即在此举行。一般而言,都会选择上午来举行,因为到了中午11时半法国总领事先要会见在沪的法侨代表,随后在12时半起在法国总会要举办晚宴。这样一来阅兵典礼就只好安排在早间,一般是上午7时15分在法国总领事署举行升旗仪式,随后8点开始在顾家宅公园举行阅兵典礼。^⑧到了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法租界内各机关、团体、学校、法国商行等均放假一天,这些单位、法人住宅及界内许多商店,都在建筑屋顶或楼前悬挂法国国旗,上午,法租界当局举行三项活动,一为领事馆升旗,二为法国公园阅兵(也曾在凡尔登花园内举行),三为领事馆举行庆祝招待会。^⑨法国公园内8000多平方米的大草坪即为阅兵之处,白天阅兵,晚上放焰火,并举行舞会。以1927年的具体情形为例,“上午八点时,驻沪法总领事那齐君,身穿礼服乘车至顾家宅公园内,会同驻沪法国海陆军举行阅兵。即

① 《申报》1918年11月13日。

② 《申报》1918年11月16日。

③ 《申报》1918年11月20日。

④ 《申报》1918年11月22日。

⑤ 《申报》1918年11月20日。

⑥ 《申报》1918年11月23日。

⑦ 《申报》1914年5月17日。

⑧ 《公园可以养成市民之道德心》,《申报》1926年1月4日。

⑨ 《法国民主纪念》,《文汇报》1938年7月13日。

⑩ 参见郑祖安:《海上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由法国海陆军兵士与越捕,与中华义勇队等操演”。^①阅兵仪式上,法国当局会颁发勋章、奖章,表彰并嘉奖那些对法租界的政治、军事事务等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沪绅陆伯鸿君,任法租界华董已20余年,与法国官厅办理外交事宜颇称融洽,对于慈善事业尤具热心,法国政府特赠与荣光勋章。前日法国民主纪念日在顾家宅阅兵之际,法海军上将暨法总领事代表法政府举行赠勋典礼,为陆君佩带”。^②礼毕,法国公董局在法外滩领事馆内举行庆贺大会,来宾道贺,法领事馆设宴款待。

在阅兵典礼当天,前往公园观阅典礼的观众人数众多,“必甚拥挤,所以规定行车规则,自晨7时半,在环龙路东段环龙路至马斯南路之间,除有通行证外,一切车辆概不准通过。”^③另外法国国庆日当天盛况空前,法租界每年庆祝该日,都会“在霞飞路沿街挂满红白蓝三色彩灯,还会在环龙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园门口建塔牌楼,饰以灯彩,入夜电灯齐明,耀如白昼。”^④另一份史料也描绘了节日当天的盛况,“园中草地四周建灯杆十余,缀以各色电灯,望之如火树银花。”“园内遍悬灯彩,如入不夜之城。”^⑤晚间举行的庆祝舞会一直到午夜方散。此情此景让不少驻足观礼的国人慨然而叹:“未闻吾国人在国外之举行双十纪念者,其状况为何若苟在法华侨能于巴黎公园中而欲举行此种盛会。此必为不可能之事。”^⑥国人在对法人庆典暗自嘉许,表达倾慕之情的同时,反诸己身,不免顾影自怜。

对于法侨而言,仪式实践是传播此类国家神话的主要方式。仪式表演不仅从认知上形塑人们对国家的想象,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作用。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通过陶醉于政治性仪式的想象,分享一种强大的感觉。政府则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发起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通过仪式获得社会团结。然而,作为观众中绝大多数的华人对此种“殖民性 现代性”交织的仪式典礼则抱有矛盾复杂的情感。就殖民性的一面而言,法国国庆庆典在华人眼中仍然只是一个“被观看”的“他者”。在这里,亲身参与变成了实时旁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世界秩序的欧洲中心观和盛行于殖民时代的西方和非西方人民之间的等级关系。法国国庆日庆典所寓意的崇高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固然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亦是法国精神的代表)。然而,当殖民当局将公共领域的大门对华人紧闭时,普世价值一说只能沦为“空洞的说教”。

但就现代性的另一面而言,法国公园里的庆典不光只是一个展示殖民成就的壮观政治仪式,更是华人模仿学习的一个机会,有机会亲身感受一下现代民族主义的规训,理解公民的责任和承担,体验积极的公民生活。众所周知欧洲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和政治文化遗产,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称为公民式民族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以全体人民(公意)的身份出现。因为所谓现代观念并非那自有永有之物,而是后天积习的产物。受过现代教育的上海市民,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获得了民族主义理想和关于自由、平等的看法。当中国观众怀着倾慕的观感,在为典礼的精彩而喝彩的同时,他(她)会知道爱国、从事积极的公民生活该是如何行动的,决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感性的体验。正是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个人经验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经验。此外,法国公园的公共活动以公共性为中心要旨,强调公共精神的发扬,公民美德的培养,对启蒙新观念的涌动和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⑦通过对法国人仪式典礼的耳濡目染,华人观众获得了现代性的体验。某种程度上逐渐唤起对法兰西信念的羡慕与向往——继而引发华人对更宽泛的共同价值的渴求。此类公共空间的实践,使民族主义与公共性融入了中国

① 《申报》1927年7月15日。

② 《申报》1928年7月16日。

③ 《申报》1928年7月16日。

④ 《三色旗迎风飘扬》,《文汇报》1938年7月15日。

⑤ 《法公园法国纪念节之盛况》,《申报》1928年7月18日。

⑥ 《申报》1929年7月16日。

⑦ 与都市公园相类似,新闻媒体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有利于有影响力的公众舆论的形成。

新生的休闲文化的方方面面,给予了“生活在中国”的具体经验和共同参与感。这表明,民众往往是通过实物和现实经历进行思考的,通过经验建立观念。并由观念的变迁引导行为的路径依赖,通过更好的参与公共生活,融入新的都市空间内,从而在注重私德的家庭空间之外,逐渐培育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共人格”(public person)。

结 论

法国公园是上海乃至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国文化空间之一。公园、电影院、咖啡馆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涌现,为近代上海人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板与日常公共性的展示舞台。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新事物,从而反映了这个城市曾经与世界的大融合。

然而,这座城市曾经被外国人统治的历史始终是中国人抹不去的创伤之一。以至不少论说在评说诸如法国公园这样一类近代公共空间的时候,往往更侧重其“殖民性”一面的表述。^①由于“西方”一词多层而含糊的意味,又进一步将“西方”与“现代”等同起来,从而将法租界当局之现代化营建,理解为徒有近代化的躯壳,而非现代性。在这种表述之下,所谓殖民的现代性,并没有主体性可言。甚至进而认为在企图构建“东方巴黎”的论述内涵中,“公共领域”之实质涵义未能落实在以“自由”、“平等”为表征的“公民社会”体系之下,而使得公园等只是形式与符号表现之场域,是一个疏离的(alien)“殖民主义空间”。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是由中国现代化开始时所处状态导出的,也就是帝国主义的闯入。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二元对立视野使得种族身份和在全球的社会位置,成为评说中国近代史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论述者往往趋向于遮蔽一些更基本之物:工业化的人类文明及其在全球背景中的作用是一种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经历。

因此,倘若平心静气的理性重估西方(譬如法国)在上海的确切位置,就可看到上海现代性不仅有殖民暴力,也有自由科学;不仅有关涉“现代化”的经济和物质指标,也有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的价值和制度变革,它是多元多样的。揆诸史实,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的法国公园固然是“殖民性的现代性”之产物。但受到西方影响之后,西方的烙印未必塑造了唯一的现代性。譬如,法国公园从早期纯粹的法式公园样式演变到今日中西合璧的海派风格,就充分体现了中法两大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在彼此的差异中可以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进而言之,西方人在上海创造的这个新世界,既不单是西方(法国)文化也不单是东方(中国)文化。经殖民统治后,上海人的文化变成独特的“中西汇聚多元文化”,我们亦渐渐认同自身的“混杂”。从更宽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近代上海的演进与张力并不只是在老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展开的,它是一个界定“多重现代性”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其中现代性和西方化(殖民化)并不是同一回事。如是观之,法国公园所显现的那种现代性,以及作为其路径的现代化,表明其非但不是一个“疏离的”城市空间,相反是一个亲密的、日常的、在都市家庭私人领域之外,所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凭借这类公共空间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人们荡涤往昔

① 近年来关于殖民主义空间的叙事在不同的研究旨趣上都有所涉及,这一论说表达了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对政治力量的关注与信任。例如,一部分观点就认为租界公园是对殖民主义空间的复制,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使其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空间。显然,在这样的论述下,“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又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是某种外部力量(无论是法国殖民当局还是本国公权力)用来支配社会,使社会在逻辑上能实现其后果的空间场域。(参见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民国研究》2005年第5期)以这一情形而言,政治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显然居于中心的位置,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甚至于将文化活动乃至日常生活都化约为政治运动与控制。与对“殖民性”和“民族性”二元对立的政治关注不同,另有一些学者试图从中西汇聚的现代性层面对近代公园加以探讨。例如熊月之就认为,晚清上海私园开放而成公园是上海都市生活的需要,反映了中西融合。(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而这一新的时代景观恰恰是现代性生长的必然产物,表明公园所承载的“现代生活”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所限,是一种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经历。或许正如叶文心所理解的,上海现代性是“全球商业与文化力量”塑造的结果。参见 Wen-hsin Yeh, “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0, Special Issue 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 (Jun 1997).

的陈见，更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城市生活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启蒙式的更为敏锐、更为灵通的公众舆论。它也并不仅仅是某种外部力量（无论是法国殖民当局还是本国公权力）用来支配社会，使社会在逻辑上能实现其后果的空间场域，更是一个新型的市民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内，刚刚脱离乡村生活的上海人体验了以西方物质文明为表征的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愉悦和感受上，更反映在都市人价值观念层面的更新与变迁上。譬如，法国公园的庆典仪式带给华人观众的强烈体验，就慢慢启蒙了他们观念的变化——民族认同、国家意识、人的尊严、对人的权利的理解、公民文化、理性、进步与自由的追求。在这些情境中，在组织日常生活中发挥很少作用的国家与民族身份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引人注目。通过将华人放置到法国国庆庆典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并藉着这一情境来激活共同感与公民身份。这个过程也可称为情境基础上的激活（setting-based activation）。显然，这一现代生活方式超越了地域、种族所限，而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经历与体验，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当然，对于法国公园所展示的“现代生活”，人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面对近代上海的多元化和紧张性，我们不禁要问，“摩登上海”的美好愿望真能轻易地被定义、辨认、识别和促成吗？

（本文为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规划项目成果；马淑培提供了部分史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素 一）

Edi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Early World Exposi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f Merchants in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YU He-ping

It has been recognized that world expositions help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but less has been studied on how it performs such functions. Actually, most of the visitors of world expositions before 1928 were people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ircles. And more and more Chinese merchants in modern China took advantage of the Expos to develop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Expo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of Chinese mercha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ino-foreign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Perplexities of a “Besieged City” –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XU Zhe-na

Si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come about in social culture and life styles. The ancient people commented on thes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ming diversified value orientations and concepts.

From Suzhou to Shanghai: Pingtan and Change of Urban Culture Circle TANG Li-xing

After Pingtan came into being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t gradually became the cultural symbol of Suzhou and served as part of the life of Suzhou citizens. In modern China, the center for Pingtan Art showed a tendency of shifting from Suzhou to Shanghai. Pingtan even reached Nanjing and Ningbo in the 1930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ingtan developed among people who spoke the Wudialect. It is also popular in Hongkong and North America. The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ulture circle and the change of era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in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Space of France and Modernity of Shanghai: Focusing on French Park

SU Zhi-liang Jiang Wen-jun

French Park is the first French style park in Shanghai and China, and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Luxembourg in Shanghai.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French Park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ublic space of modern Shanghai. The appearance and evolution of French Park showed the mutual inspe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French civilization. In French park, people experienced a modern life featuring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is kind of modern life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material enjoyment but also in the change of values and concepts of urban citizens.